

论夏丏尊语文教学改革的 思想

俞 越 龙

夏丏尊既是作家也是语文教师，但他首先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语文教师。他曾以自己毕生的精力，从事于语文教学工作或语文教学的研究工作。他早年留学日本，1908年归国后，曾先后在浙江一师、湖南一师、春晖中学、浙江四中、立达学园、暨南大学等校任教。1926年起，他出任开明书店编辑所所长，先后创办《一般》、《中学生》等刊物。他从事编辑、出版工作后，依然以极大的热情，为语文教学的科学化进行着辛勤的探索。

夏氏语文教学研究的主要著作，有他与刘薰宇合撰的《文章作法》（1926年），有他与叶绍钧合著的《文心》（1934年）、合编的《国文百八课》（1935年）、合写的《文章讲话》与《阅读与写作》（1938年）等五部。这五部书都是开明书店出版的。

根据语文学科的性质探索教学规律，以促进语文教材、阅读教学与写作教学的科学化，这是夏氏语文教学改革的 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

一、关于国文教材的改革

三十年代，夏氏在一次与中学生讲话中指出，国文科教科书存在着教材没有序列、内容杂乱的弊端。

夏丏尊与叶绍钧合编的《国文百八课》，正是针对国文教材没有序列、内容杂乱的弊端所作的一次教材改革。

《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开宗明义地说明，“本书编辑旨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想给与国文科以科学性，一扫从来玄妙笼统的观念”。对教材作科学性的探索，这是本书的显著特色。这一特色，是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出来的：

1. 它重视国文教材的序列化。

《国文百八课》的序列化，是从教材组合的系统化中显示出来的。这个教材系统既有百八个单元

结构系列所形成的纵向系统，又有百八个单元结构内部联系所形成的横向系统。

《国文百八课》是一部侧重于形式，研究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课本。教材采用以单元为单位的混合编法，每课一个单元，百八课就是百八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文话、文选、文法或修辞、习问四项，各项打成一片。每个单元的教材组合，都有“一定的目标”。在单元中，“文话”是中心，讲文章理法知识，百八课就有百八个知识点，连起来就是文章学的知识体系。这样的知识体系是教材纵向系统中的基本骨架，是形成序列的核心因素。文选“列古今文章两篇为范例”，可见它是服务于文话的。一篇篇的文章，就是用以说明文章理法的一个个的例子。“文法或修辞”从文选中取例，但仍保持着各自固有的系统。“习问”相当于练习，但它的作用不局限于复习巩固与能力训练，而且使单元内部的各方面知识“打成一片”，这是单元内部的横向联系。这种横向联系，显示着教材的横向系统。综观《国文百八课》，不难发现它是一个以其纵向系统为经横向系统为纬的教材系统。“文话”是教材系统的轴心，纵横两个系统都是受它制约的。这种以文章学知识体系作为编写教材序列的方法，至今依然被人所用。它的生命力，源于它的科学性。但遗憾的是，这套课本出了四册之后，由于抗战的影响，剩下的两册未曾问世。

2. 它重视理论知识对语文学习的指导作用。

《国文百八课》所以要以“文话”作为单元的中心，不只是为着求得教材的序列，而且也显示着理论知识对学习语文的指导作用。学生掌握了文章理法知识规律后，就能在阅读与写作中摆脱盲目性，提高自觉性。而以文选作为文话的范例，则更有助于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中去切实掌握知识规律。

3. 它重视读写知识的讲授顺序。

在已出版的四册课本中,第一、二册着重讲记叙文的理法;第三册着重讲说明文的理法;第四册着重讲议论文的理法。但三种常用文体不能包罗所有文章,于是把非常用文体或需要强调的文章另组单元,按难易依次穿插在各课本的重点内容之前。比如第三册十八课,十三课用于讲说明文理法,其余则作讲小说、韵文与散文的区别以及诗的本质的穿插用;第四册除讲议论文理法的重点内容外,又穿插讲了学术文、宣言、对话、戏剧、抒情诗、叙事诗等内容。

“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的讲授顺序,体现着由浅入深、从易到难的顺序,它符合于初中学生从具体到抽象,从形象思维到逻辑思维的认识事物、事理的规律。这一讲授顺序,突出了记叙文理法这个重点。第一、二册基本上是讲记叙文理法的,第三册的小说理法、第四册中的对话、戏剧理法,也同样是属于记叙性质的。

夏氏把记叙文分为记事文与叙事文两类。记事文与叙事文虽同属记叙事物的文字,但“记事文以记叙事物的状态、性质、效用为主,而叙事文以记述事物的动作、变化为主。所以记事文是静的,空间的;叙事文是动的、时间的”。(《文章作法·第三章》)显然,读写叙事文的难度是大于记事文的,这也就是夏氏所以把小说、戏剧等理法穿插到第一、二册之后的缘由所在。

4. 重视语文学习的社会功用。

《国文百八课》与同时期的其它国文教科书相比,显示出它鲜明的社会性的特点。具体体现在课本中的语体文篇数,在比重上超过了文言文(3:2),说明文特别是应用文的比重越出了其它国文教科书的选篇数。

这种特点的出现,正是夏氏根据国文科的性质探索教学规律所取得的积极成果。语文科的工具性与基础性,决定着教学工作不能单纯着眼于学生的升学,而应考虑到他们出校后的社会工作与社会生活。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夏氏才一反“坊间现行国文课本”排斥“应用文”的作法,提出了“应用文为中学国文教学上的一个重要纲目”的看法,并在编辑《国文百八课》时“从第一册起即分别编入此项材料,和普通文同样处理”。(《〈国文百八课〉的“编辑大意”》)这在三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不能不说是一种远见卓识。

5. 它重视从形式上去探究国文学习。

夏氏认为,“中学里国文科的目的,说起来很多,可是重要的目的只有两个,就是阅读的学习和

写作的学习。这两种学习,彼此的关系很密切,都非从形式的探究着手不可”。(《国文百八课·文话一》“从形式探究”,这是夏氏从多年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条带规律性的经验。他说:“不论国文、英文,凡是学习语言文字为不着眼于形式方面,只在内容上去寻求。结果是劳力多而收获少。竟有许多青年在学校里学过好几年国文,而文章还写不通的。其原因也许就在学习未得要领”,“因此,我们主张把学习国文的目标侧重在形式的讲究”。(《关于〈国文百八课〉》)

由此可见,夏氏所以重视从形式上去探究国文学习,是出于尊重国文学科性质的客观实际与提高学生读写能力的客观需要。

二、关于阅读学改革的思想

三十年代的中学国文教学,夏氏曾在不同场合揭露了以下弊端:

第一、中学国文教学没有明确的目标。

第二、中学国文教学没有标准读本。

第三、国文科缺乏客观具体的科学性。

当时中学国文教学中出现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其主要病根盖出于上述消极因素。夏氏的阅读教学改革的思想,就是针对上述弊端而发的,总的意图是企图把阅读教学纳入“科学性”的轨道。

(一) 选文要讲求系统。

课本是教学之本,教学的成败,课本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但当时的现实却是“中学国文尚无标准读本,中学国文课程中的读物,大部分是选文”(《关于国文的学习》),因此夏氏不得已而要求教师讲求选文的系统。选文如无系统,学期的或学年的教学目标与教学要求也就无法确定,那势必会影响教学质量。

夏氏要求教师确定“一学年或半学年的选文系统”与选文的篇数,并把选篇数按内容与文体的编选要求分别进行分配。选文成了系统,也就为进一步去制定教学目的与教学原则提出了客观要求。这样必能抑制教学上的自由主义,有助于摆脱教学的盲目状态。

(二) 提出了能力培养与学力检验的标准与方法。

夏氏认为,阅读能力主要是“理解”与“鉴赏”两种能力。“理解”,要求“能从文字上理解他人的思想感情”,“不至于十分理解错”;要求“能看得懂普通的旧书籍”。“鉴赏”,则要求能鉴赏诗、赋、词、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

怎样培养“理解”与“鉴赏”这两种能力？夏氏的主张是：

理解，需着眼于“辞句”、“全文”的理解，即能正确解释辞义，逐句通解文句，要了解某篇文章的“各句各段及其全文的旨趣所在”。

“鉴赏”是要知道文章“每句每段或全文的好处所在”。阅读不能停留在理解上，而需养成鉴赏的习惯与能力。

夏氏提出的“理解”与“鉴赏”两种阅读能力的标准与培养方法，较之当时国民党政府颁行的“课程标准”所规定的中学生国文科毕业最低限度的相应要求，不论是切实性还是科学性，都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夏氏的阅读教学所提出的学力检验的标准是：

第一、通过“翻译”与“评改他人的文字”两种标准来检验学力。这样的标准，不只可检验阅读能力，也可检验写作能力。

第二、通过“标点与分段”以及“常识的测验”的标准来检验阅读能力。

第三、通过“理解语汇”与“运用语汇”的标准来检验阅读能力。

综观夏氏的培养语文能力与检验语文学力的标准与方法，可以发现一个鲜明的教学思想，那就是着意于培养中学生的自学习惯与自学能力。既有标准又有方法，那就是显示了这一教学思想的科学性的客观基础。

(三)从教学的实际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改进阅读教学方法。

1.要改变“单打一”的学文方法，指导学生运用以“选文为中心”的“扩张探究法”。

夏氏认为，“单打一”地教学选文，一学年或半年下来学生所学的篇章有限，得益甚微。为扩大学生的阅读面，提高他们的学习收益，夏氏主张应采用以选文为中心的扩张探究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在学生理解了选文的形式与内容后，进一步指导学生“由此出发，作种种有关系的探究，以扩张其知识”。

这种以选文为中心的扩张探究法，实际上，是一种文科科研的基本方法。掌握这一方法，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益于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的。

2.要反对“空泛的读书方法”，指导学生用务实的精神去治学。

三十年代初，在中学生中出现了一种坏学风，“大家读书不喜欢努力于基本的学修，而好作空泛工夫”。普通学生的案头都放着各种文学史、哲

学史等书籍，而对文学史、哲学史中所涉及的著作却一概没有读过。对于“这种空泛的读书方法”，夏氏大声疾呼：“大有纠正的必要！”为纠正这种坏学风，夏氏提出了一个“先解决小钱，然后用钱索子贯串整理小钱”的治学方法，“用譬喻说，《论语》《春秋》《诗经》《礼记》是一堆有孔的小钱，《哲学史》的孔子一节是把这些小钱贯串起来的钱索子”，“没有钱索子，不能把一个个的零乱的小钱加以贯串整理，固然不愉快，但只有了一根钱索子，而没有许多可贯串的小钱，究竟也觉无谓”。因此夏氏的结论是：“我敢奉劝大家，先读些中国关于哲学的原书，再去读哲学史。”（《关于国文的学习》）

夏氏所提出的，是一个很重要的治学方法：先解决各个“点”，然后连“点”、“线”。一待“线”出现得多了，“面”也就自然形成了。说的是“史”的研究方法，其它文科的研究方法未尝不是如此。

3.要根据中学生文字感受能力弱的特点，“传染语感于学生”。

学生因受经验能力的限制，对文字的感受能力是较弱的。他们“在讲解正课以及课外读书中，对于一句或一语的误解不必说了，即使正解，也决非全解，其感受的程度是很浅。收得既浅，所发表的也自然不能不简单空虚”。因此要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不能不重视语感教学的工作。

尽管教师自身也并不能全体感受任何一文字的内容，但“一般作教师的，特别是国文科教师，对于普通文字应该比学生有正确丰富的了解力”。教师要“自己努力修养，对于文字，在知的方面，情的方面，各具有强烈锐敏的语感”，然后“传染语感于学生”，使学生“也感得相当的印象”而这样做的作用，在于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文字的知与情两个方面的内容，这将对学生读写能力的提高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以上引文均出《我在国文科教授上最近的一信念》）

(四)要抓课外阅读指导。

课外阅读能对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与自学能力发挥特殊的作用。为着促进中学生的课外阅读，夏氏曾对课外阅读的读物与方法，发表了宝贵的意见：

1.关于课外阅读的书籍。

夏氏对中学生的课外读物，曾从不同角度，提出过三种意见：

其一：在《国文科课外应读些什么》一文中，

夏氏介绍了如下三类读物：一是“关于文字理法的书籍”。包括“语法或文法”、“修辞学”、“作文法”；二是“理解文字的工具书籍”；三是“文字值得阅读内容有益于写作的书籍”。介绍这三类书，显然是为着培养学生的自读能力与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而这两种能力则是自学能力的两个侧面。

其二：在《关于国文的学习》一文中，对“读书的范围”提出下列意见：第一、“因选文而旁及的”；第二、“中国普通人该知道的”；第三、“全世界所认为常识的”。显然，介绍这三类课外读物，意在扩大学生的视野，丰富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文化教养。

其三：在《阅读什么》一文中，对“阅读的范围”又提出了另一种意见，即：“（一）是关于自己的职务的，（二）是参考用的，（三）是关于趣味或修养的”。这样的课外读物，显然不只限于中学生眼下的阅读，而且放眼于他们未来的工作与生活的需要。

2. 关于课外阅读的方法。

第一、阅读“职务上的书”要确定“阅”与“读”的不同侧重点。

学生职务上的书，就是教科书。他主张，阅读不同性质的教科书应采用不同的阅读方法：“属于一般的该偏重在阅，属于语言文字的，只阅不够，该偏重在读。”但这样是的说法带相对性的，事实上，所有教科书都离不开语言文字这一表达形式，而且有的一般科学教科书的语言文字很有特色，“未始不可作为写作上的参考模范”。因此，夏氏最后的结论是：“任何书籍都可有两种说法，如果就内容说，只阅可以了，如果当作语言文字来看，那么非读不可”。

夏氏对不同性质的读物需确定“阅”和“读”的不同侧重点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对不同性质的读物，应采用“略读”与“精读”两种阅读方式。“略读的目的在理解，在收得内容，精读的目的在揣摩，在鉴赏”。（以上引文均出自《怎样阅读》）

第二、使用参考书要确定参考范围，并乘便了解参考书的性质和内容大略。

在到图书馆去寻参考书以前，我们应该先问自己，我所想参考的题目是什么”。（《阅读什么》）正因为寻找参考书是为解决某问题的，因此使用参考书时就需“暂时认定参考的范围”，不然就会把“自己所要参考的项目或问题抛荒”。

翻阅参考书虽有明确的目的性，但在阅读过程中，不能只是着眼于解决某一问题，而应乘便留意所参考书籍的性质和内容大略。这样，“可以收许多

多书籍的概括的大略知识”，久而久之，“就知道哪些书里有些什么东西，要查哪些事项，该去找什么书，翻检起来，非常便利”。（以上引文出自《怎样阅读》）

第三、对于“趣味修养的书”，要精选，阅读时要求助参考，不要受时间的限制。

阅读时，应“把自己正在读着的书做中心，再用别的书来做帮助”，这样才能使“读着的书更明白，更切实有味，不至犯浅陋的毛病”。（《怎样阅读》）

三、关于写作教学改革的思想。

夏丏尊写作教学改革的思想，是针对中学写作教学中的存在着盲目性与随意性的时弊而发的，意在使写作教学能遵循写作法则去指导学生写作。

1. 写作教学要指导学生注意平时积累题材。

夏丏尊说：“‘写作些什么’的‘什么’，无论自由写作或命题写作，只靠临时搜集，是不够的。”临时搜集不着，当然无话可说了。因此，写作教学应指导学生“预先多注意，从读过的书里，从鬼到的世相里，从自己的体验里，从朋友的谈话里，广事吸收”。也就是说，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平时善于从自己的学习生活、社会生活中去观察体验去积累各种写作的素材。素材的积累、主题的酝酿，便是夏氏所说的“郁积”。写作则是“一种郁积的发泄”，如果没有“郁积”，当然也就无从“发泄”。（以上引文出自《关于国文的学习》）

2. 写作教学要指导学生掌握“明了”与“适当”两个基本的写作法则。

“明了”与“适当”，是夏氏提出的两个写作标准，也是写作法则。所谓“明了”，是求“文句形式上的明了”与“内容意义上的明了”。“明了是形式上与部分上的条件”，而“适当”则是“全体上态度上的条件”。“适当的文字”应达到“对人适当，对时适当，对地适当，对目的适当”的要求。夏氏认为，写文章会遇到六个问题：

归结起来说，就是“谁对了谁，为了什么，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用什么方法，讲国文么话”。（《关于国文的学习》）

“适当的文字”也就是合乎这六项答案的文字。

学生掌握了“明了”与“适当”两个标准，也就掌握了写作的基本法则。夏氏认为，要作好文章固然需要在“多读，多作，多商量”方面下番切实的功夫，“但法则究竟能指示人以必由的途径，使人得到正规”（《文章作法·绪言》），从而能提高写作的自觉性，促进写作水平的更快提高。